

徐翠梅:留守少年的守护人

□ 本报记者 郑丽君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一部《妈妈再爱我一次》,曾让90年代初的中国万人空巷。然而,伴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已成为这个社会最现实的“痛”,尤其是对孩子而言,父母远走他乡,让他们在现实中成了“没妈的孩子”,小小的心灵里埋下的,竟是“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的孤寂与悲凉。

在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紫庄中学,有这样一位教师:过去11年,她是15个留守少年的“代理家长”,陪伴他们度过整个孤独、叛逆的青春期;她十年如一日地关心、关爱学校的留守少年,用老师的情、“妈妈”的爱,滋养着这些在家庭教育中“营养不良”的孩子们。

她,就是徐翠梅,2000年毕业后一直在紫庄中学担任语文教学工作,学校留守少年儿童工作主要负责人,兼任校心理咨询师,2014年江苏“最美乡村教师”。徐翠梅知道,与低龄留守儿童不同,中年的留守少年因为长期缺乏爱与理解,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叛逆、不羁、漠然和粗暴。因此,做留守少年的工作,比做留守儿童的工作要困难得多,辛苦得多。

小亚,其亲生母亲早在他3个月大时就和父亲离婚了。后来父亲和继母又有了自己的孩子,长期生活在青岛,小亚几乎是被父亲遗弃了……特殊的家庭造就了小亚桀骜不驯的性格,养成了打架、上网、抽烟等不良习气,成绩更无从谈起。对他,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徐翠梅却做了他的代理家长。

在小亚最叛逆的那个时期,徐翠梅给了他母亲般的抚慰和照顾,定期去家访,单独为他辅导功课、谈心,有时把他带回家,为他做可口的饭菜……渐渐地,小亚变了,他不再违纪了,成绩有起色了,后来考上了技校,成为一个有一技之长的阳光男孩。

小亚只是徐翠梅众多“孩子”中的一个,她喜欢将这些学生称之为“亲爱的宝贝”,尽管有的学生个子比她还高。她每认领一个学生,都要从初一坚持到初三,陪伴他们度过整个初中阶段,学生们都亲切地叫她“徐妈妈”。

曾经有人问徐翠梅:“大多数留守孩子的父母忙于挣钱无暇顾及他们,你一个代理家长能顶什么用?”徐翠梅却说:“如果家庭亲情缺失,再得不到学校教育

的弥补,那会耽误多少孩子的前途啊!”

2011年4月26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深度报道了这位优秀的“代理家长”,让徐翠梅一夜之间成为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名人。第二天,走在街上的她遭到了“围堵”。“你是不是能教育好留守学生的老师?”“我的孩子也有网瘾,你能帮帮我吗?”……那一刻,徐翠梅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做留守少年的守护人,为他们撑起一片晴空的决心。

徐翠梅深知:作为教育者,对孩子“成人”的教育比“成才”更重要。只有充分发挥活动育人的功效,才能让留守儿童融入到集体的大家庭中,学会感恩,学会担当。

2012年暑假,徐翠梅带领一部分留守少年去徐州一个建筑工地体验生活。其中有个学生,看到农民工在炎炎烈日下挥汗如雨的劳动情景,突然泪流满面,哭着说:“我错了,我想爸爸,他累死累活全都是为了我呀!”在场的所有人,无不感慨万千。这次体验教育,使不少学生的学习态度和人生观发生了逆转,也让徐翠梅坚定了活动育人的留守少年教育思路。于是,便

有了2013年夏天“最难忘”的那一次操场烧烤晚会,有了刚升入初一留守少年“最开心”的那一次“集体生日庆祝会”,有了“最有意义”的为“保护环境,爱我母校”组织的学生“义卖”……

近几年,徐翠梅在留守孩子教育中,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精神留守,即虽然父母都在身边,但由于工作和自身原因,缺少对孩子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关心。为此,徐翠梅已开始探索关爱留守孩子的另一条途径——设立心理咨询室,举办家长学校,为更多的留守孩子服务。她每学期至少给学生做3场心理讲座,并定期召开家长会,对家长进行相关培训。在她的带领下,紫庄中学全校教师都义务做起了留守少年“代理家长”,惠及当地留守少年2000余人,学校还实施了“一二三”工程,为更多的孩子提供亲情陪伴和生活指导。

教育是需要坚守的。徐翠梅在平凡的岗位上十年如一日,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实现自己为人师表、为社会做贡献的人生目标。正如她所说,对孩子的关爱永远不变,为教育献身的初衷至死不改。

唤醒每一个 终将自由的灵魂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践行素质教育6周年记

□ 刘亚文

“城市学校有更好的课程资源,我们希望通过共享资源,让农村和城市的孩子都拥有更好的课程体验。”9月5日,退去夏日燥热的上海,天高云淡,清风阵阵。但在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的会议室中,300多名教师却不顾因为拥挤而额头微汗,专注聆听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真爱梦想)理事长潘江雪的激情演讲。这里将成为真爱梦想的第一个位于城市的课程中心。

2008年创办至今,真爱梦想已经走过了6个年头。从乡村图书馆,到配备电脑的多媒体教室,再到课程互动教室,真爱梦想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已从热心帮助走向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在许多人眼中,曾经担任香港招商证券董事的潘江雪拥有令人艳羡的工作,她本该叱咤商场,却为何做起教育公益?

潘江雪曾几入藏区,触动她心灵的除了雪山、金顶、经幡,更有她看到的人。当她走进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中心小学,教师恳请她带来“图书和电脑,让孩子了解外面的世界”时,她意识到,“是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呈现这样的精神状态”。

2007年,潘江雪辞去工作,与朋友一起成立了真爱梦想基金会,给马尔康县中心小学捐建了第一个“梦想中心”。直到2008年5月28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始终有人质疑潘江雪,她却回答:“我看到了很多和我一样的人,大家有着另一种工作目标——为意义和乐趣而工作。”

“梦想中心”是一个以标准化方式建设的学校内的一间多媒体教室,拥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上千册图书。目前,真爱梦想已建成的1219间“梦想中心”,分布在全国30个省区市的338个区县,服务了超过123万名学生。当越来越多的“梦想中心”成立,需要怎样的软件支持其健康运转?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促进学生发展的载体是课程。”2009年,他们构建了“梦想30课程”,并将“梦想课程”的价值追求定位于“全人教育”理念下的创新、多元、宽容。“梦想课程”有三部分内容:我是谁——认识自己,我要去哪里——有梦想,我要怎样去——路径与方法。“梦想课程”一推出就受到学生的喜爱,重庆市西阳阳光小学学生曾颖说:“我喜欢‘梦想中心’,喜欢在这里上课、读书和想象未来!”

“教师是课程的第一生产力”,如果教师不接受新的理念,“梦想课程”将很难推广下去。2010年,真爱梦想启动“梦想教练”计划,为一线教师培训。改变别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真爱梦想课程培训部主管蒋文慧深有体会。

在一节“梦想中心”种子教师的理财公开课上,台下教师质疑这些理财知识“学生根本用不到”,蒋文慧不得不代替羞涩的授课教师耐心解释。“其实,我也不害怕”,再谈起此事,她依然有些激动,但也多了一份理解,“他们只是不了解课程背后的真正目的”。

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收获的是感动。家境贫寒的农村教师,宁愿每天打车也要参加培训;71岁的退休教师,不顾老伴儿的阻止,只为“体验快乐”。作为“梦想领路人”计划的种子教师,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第九小学教师徐峰通过上梦想课,改变了自己和学生。从他一个人的行为,到学校74%教师的共同行动,“梦想让我的人生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徐峰坦言。

曾在甘肃兰州插队的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陆蓉,这位以“农村女教师”自称的“梦想教练”计划志愿者,从未忘记农村学生朴实的脸庞。2012年,50多岁的她以志愿者身份回到那里,为教师们带去与众不同的培训。“这是一场充满趣味、高参与度的体验式培训,希望教师们可以把感受到的快乐传递给学生。”她认为,“教师培训应着重唤醒教师成长的内动力,而内动力要在体验中获得”。

与陆蓉一样,梦想刚开花的时候,还有真爱梦想副秘书长胡斌。胡斌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出差,每到一地方,他都会给教师和队友挑选各种图书。这样的奔走,换来的是1539所学校的20094名教师的成长。

真爱梦想秘书长吴冲认为:“慈善资产实际上和其他商业资产一样,需要管理牧羊人,我们要像管理上市公司一样管理慈善。”真爱梦想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披露信息,聘请专业人士制作“无水分”的资产负债表,定期披露所有花费及捐赠……因为这份坦诚与热爱,真爱梦想得到了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

2013年,山西运城盐湖区与真爱梦想达成协议,3年内共建100间梦想中心。这是真爱梦想发展6年来一个里程碑。2013年真爱梦想不仅强化了城市地区的培训,同时也为各地优秀的梦想教师举办深化技能和领导力的2.0版教练培训,以及梦想沙龙专题研究。去年底,真爱梦想资助的35个沙龙覆盖了185所学校的种子教师。

今年,真爱梦想将着重城市学校课程建设,在与更多城市合作的过程中,深挖课程资源。与农村学校关注硬件条件不同,城市学校更注重真爱梦想的课程和教师培训。所以,“我们会推荐城市学校选择‘梦想与团队’、‘共创成长路’等多元的国际化视野的课程。”真爱梦想课程与培训部副总经理兰璇说。

今年1月,真爱梦想取得了新的公募基金会登记证书,发展的第6年,“公募资格和政府合作让我们在面对全新的客户群时,不断反思原有的产品。”潘江雪说,“很难说未来10年真爱梦想具体在做什么,但我们一定是站在教育的最前沿,努力找到教育的核心问题,并创造性地提供解决方案。”

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沉默时,他们却在用最动听的声音、最真实的行动,“唤醒内心的力量,唤醒对可能性的好奇心,唤醒柔软而坚定的爱,唤醒每一个终将自由的灵魂”。这是他们对捐赠者的承诺,更是对每一个灵动生命未来的憧憬与守护。

▼ 图片新闻

9月17日上午,西藏公安边防总队吉隆边检站在吉隆镇完全小学为贫困学生发放爱心帮扶物资。今年8月初,这个站通过网络搭建“爱心桥”,发起了“一对一”资助西藏贫困学生活动。

——郑永波/摄



高考改革:突破与挑战并存

(上接1版)

“新闻上说,北大现在农村生源只占到10%,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基本上等于北京人的大学加城市人的大学了。”潘其勇说,“寒门子弟上学问题、接受优质教育问题应该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了。”

“我们国家招生加分分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照顾性加分,包括少数民族、港澳台学生,第二类是奖励性加分,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特长生等。”杨东平说,政策性、照顾性加分要保留,但是奖励性加分应大幅度取消,尤其是要明确取消文艺和体育的加分。“我个人的想法是像三好学生都应该取消,我们要特别关注加分政策调整的意见,照顾弱势群体政策要细化,增加靶向性,真正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杨东平认为,关于照顾农村弱势群体的招生政策,现在没有纳入科学研究的对象。“833个贫困县怎么招生并不清楚,招来的到底是贫下中农子弟,还是干部子弟?这样的政策需要特别关注,要把好事做好,使这个政策真正落实到最需要照顾的一些农村学生身上,尤其是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不然又被地方权势人物挤占了。”

在由他领衔制定的民间高考方案建议,教育部所属的高水平大学实行“统一测试、自主招生”后,不再再有分省招生计划。从各地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出发,国家制定宏观政策引导和激励研究型大学的行为改善,明确规定国立大学招收农村学生的比例。作为高校社会责任的一部分,高水平大学应公布每年录取新生的城乡、地域、阶层、性别、民族结构,促进教育公平。国家需要整合目前正在实行的具有补偿性的农村连片贫困地区定向生、免费师范生、高考加分等招生政策,实施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寒门计划”,补偿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学生的平等教育机会。

最要改革的是分分计较的评价模式

高考改革牵涉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核心到底是改什么?到底是改“一考定终身”的体制,还是改变学业负担过重的现象?杨东平认为两者都不是。“我们现在的高考模式最需要改革的是分分计较的总分评价模式。590分和591分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选拔人才。这样的制度影响了中小学的评价制度。”

在杨东平看来,当前高考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分分计较的总分评价模式,它导致了中小学智育至上、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弊端,严重妨碍了青少年的人格养成、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损害了他们的想象力、好奇心和创造力,影响了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近20年的高考改革主要是围绕考试科目进行的,而实践已经证明,单纯的考试科目改革无法改变单纯追求分数的总分评价模式。

在今年7月举行的“深化高考制度改革研讨会”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出了以招录制度为重点推进高考改革的建议,明确改革启动“自主招生”2007年和2009年之后第三次提出的民间高考改革方案。方案包括考试制度和招生录取制度两个方面。在考试制度方面提议恢复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由国家统一高考的方式和内容。国家统一高考可分为“基本学习能力测试”和“指定科目考试”两种。前者考查学生进入高校学习所必备的

能力,如概括、推理、判断、探究等基础性能力。后者是高校针对不同学科专业提出的加试科目,一般不多于2门。伴随高中课程多样化的实践,考试科目可更加丰富,形成可供高校和学生选择的考试形式和内容,以突出学生的专长和满足高校选拔学生的需要。在条件成熟后,这两种考试可一年举办数次,成绩有效期3年。

在招生录取方面,从根本上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增加人才评价的多样性,提高人才选拔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具体构想包括:实行招考分离,省级招考转变职能,制定具体招生政策,评价考生的权力还给高校,取消控制学生志愿和投档的权力;在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后,成为为高校和考生服务、管理和监督的机构,保障高考安全和考试公平等。高校实行多元和综合评价,不同类型高校可根据自身办学理念 and 学科专业的要求,自主确定采用的考试类型、成绩门槛和其他评价要求,形成多样化的录取标准,不再单纯以总分决定录取。

配合自主招生改革,高校须改革招生机制和程序,建设具有公信力的招生录取制度。包括成立有社会人士和家长代表参加的招生委员会,公开考生各项评价指标的得分,对每位录取的学生出具录取报告等。而作为配套措施,需从快制定教育考试法,引入竞争机制,促进考试机构专业化建设。

该方案认为,高考制度改革思路需要改变。刻板的总分录取模式源于招考录一体、集中录取的招生录取制度。世界主要国家多实行统一的人学考试,但是考试成绩只是一个基本标准。由高校、院系根据对人才的不同需要,形成多元化的招生标准和自主录取机制,才是破除“唯分论”的关键。“从招考分离开始,以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为重点,形成高校自主招生、高校和学生双向多选的招生录取制度,才能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

关键是加快政府管理体制变革

“高考最大的问题是招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方平认为,“我们原来很多很单纯的问题被权力和金钱绑架,在高考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他认为高考改革应该对最基本的责权利做一个梳理,这样才能够制定出一个大家比较认同的政策,为改革营造好的氛围。“很多改革由于一些根本的问题和利益处理不好,会颠覆原来设想比较好的改革。”

“高考招生制度亟需改革的主要领域是:行政包揽、计划体制、集中录取。如果不对这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躁动。”不久前由中华教育改进社举办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论坛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高考改革的关键是加快政府管理体制变革。”“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政府管理体制变革的一个部分。要简政放权,让专业组织生长发育,并逐渐把专业权力回归专业组织。要健全法治,没有健全的法治就不可能真正改革现有招生体制,要依法让政府放权。”储朝晖说,当前需要由全国人大尽快颁布考试招生法,明晰地规范与考试招生相关的各方主体的社会责任和权力边界,否则社会化的考试就缺少保障和依据,独立的第三方专业评价也很难开展。

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如何保障权力运行公平公正的问题,储朝晖提出,一要靠专业的程序设计,

每个学校要在招生章程里明确招生程序和各种标准,尽可能排除一切非专业的干扰;二是公开,学生通过什么途径进来的、各项考试和测试的成绩,以及所有不涉及隐私的信息都要公开;三是明确责任边界,学校内部的招生要明确学科到学院再到学校层级的招生权限和责任,建立内部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四是建立常规的外部监督,包括建立政府对高校招生的监督问责和招生违规举报查处制度,保障家长和考生的监督权的行使。

储朝晖强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坚持几个原则。“大处着眼:看远点,不要让眼前的利益羁绊住脚步。小处着手:做细点,让变革逐渐积累。积极态度,稳步前进,不走极端,不走弯路。将高考招生改革与学生发展、教师使命与国家战略合而为一。”特别是相关各方要共同努力,“肩负起改变的责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打破不应存在的垄断,就是争取全社会发展的更好机会。”

以改革促进改革

新的高考改革方案有很多重要突破,但毋庸讳言,这一方案离公众的期待和教育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面对教育的理想要求和复杂的现实,高考改革还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方案出来以后,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走了半步。有人觉得很失望,觉得只走了半步;有人比较欣慰,终于走了半步了,我是属于欣慰的那拨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说。他认为,中国高考需要改革,不是因为不公平,而是因为没有效率。“我们60多年了没有获得一个科技方面的诺贝尔奖。小布什教育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我们问题不是一个不能少,而是一个都上不来!”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东茅也持相似态度。“我对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走出了半步总比不走好。”他同时提出,“考试是教育的基本制度,我觉得应该以育人作为所有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特别希望坚持的,但是这方面现在突出不够。”

高校自主招生是招生录取乃至整个高考改革的核心,当前因为公众对腐败的担心等原因难以真正落实。杨东平认为,不能因为担心腐败而拒绝改革,需要建立“以改革促进改革”的新思维,通过程序公正、信息公开、具有公信力的制度建设,促进高校落实自主权的改革。“我们的想法是以改革促进改革,高校首先建立一套具有公信力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程序都很健全,你能够取信于民,我再给你比较大的自主权。一开始可以从少数学校开始,三五所、十所八所,这样改革就有一个生长点,不用担心因为腐败所有的学校永远在原地踏步。”

早在2010年7月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提出,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基本认同了教育规划纲要的思路。杨东平认为,目前的《实施意见》与三中全会关于考试招生改革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尽管如此,杨东平对这次改革的未来仍然表示审慎的乐观:“这不是一个目标模式,改革仅仅才刚刚开始启动。”